詮釋學在當代的意義

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特聘教授洪漢鼎

一． 20 世紀 90 年代初德國電視舉辦一次關於“人類缺少什麼”的電視談話，邀請者有 90 高令的伽達默爾。談話的出發點是前蘇格拉底時代的一句晦澀的話：“人類之所以走向毀滅，是因爲他們不能把起點與終點聯結起來”，據說這句話是一位古希臘醫生並且曾是畢達哥拉斯的學生阿爾克邁所說，此人大約生活於公元前 6 世紀末。這句話的後代詮釋是：自然界日月星辰能把終點與起點聯結爲一個整體，故它們冬去春來，週爾複始，永恒存在，而人類卻不能這樣循環，他們死而不歸，一去不返，故必然毀滅。用歌德的話來說，自然界春夏秋冬，日夜交替，在每一次結束之後又有一次新的開始，而我們人類在自己的生活旅途中卻是不斷踉蹌地跌倒。這句話的現代詮釋是：我們之所以走向毀滅，是因爲我們不能思攷一種我們能從其整體性出發正確生活的原則或統一根據。

哲學歷來就有一個計劃，就是抵擋這一跌倒，就是盡量使不知所措的人鎮靜下來或使他們恢複平靜。哲學從一起始就在尋找這種統一基礎，提出了各種解決方案，但這些方案通過尼採和後現代主義，似乎都被徹底地推翻了。

二． 黑格爾說：哲學就是“在思想中把握它的時代”，什麼是我們和我們時代的狀況呢，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詮釋與文化，這應當說是針對當代而說的，當代是何特征呢，正如很多人所說，這是一個危機時代，從各方面的情況看來，我們這一時代確實可以說是危機時代，如經驗危機，科技危機，政治危機，民族危機，甚而宇宙危機。對這種危機時代，我們可以從兩位哲學家的思攷尋求一些途逕。我們知道，胡塞爾和海德格在 20 世紀 30 年代曾經不約而同地對這個充滿了深度危機的時代提出了診斷，他們認爲這個時代的根本危機在於遺忘，在胡塞爾那裏是對生活世界的遺忘，而在海德格那裏則是對存在的遺忘，雖然身處遺忘中的人無法提供治療方法，但作爲社會醫生的古老角色，哲學家可能通過對歷史災難病譜系(Anamnese)分析，即通過發現最初的開端和對它的特性的分析來促進診斷。胡塞爾最早用了一詞即“觀念化”(Idealisierung)來解構當代危機的起源。什麼是觀念化呢，簡單說，就是用一種理想的所謂完美的境界來規範或控制自然和社會。舉胡塞爾的例子，當一個木匠在制作一個圓桌時，他要求他所制作的圓桌盡量達到圓，顯然肉眼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要引用工具如圓規等，但這還不能完美，再後必須要引進木制機械，即使這樣，我們也不能說我們制作的圓桌已達到絕對的“圓”和絕對的“平”。胡塞爾在其<歐洲科學危機與先驗現象學>一書中用伽利略的例子來說明這種觀念化的過程。在我們要求平面的精確性中，我們的思想完全被那些導向它們不斷完美化的過程所控制，我們不斷想象有一個過程，在這過程的結尾，我們有能力達到這樣一個終點，即一種極限值，絕對的“平”。正是這種觀念化，我們脫離了真正的生活世界，我們都按一種理想的絕

對值來看待自然和社會，他說：“自伽利略起，觀念化了的自然就開始不知不覺地取代了前科學的直觀的自然…..在幾何的和自然科學的數學化中，在可能的經驗的開放的無限性中，我們爲生活世界(即在我們的具體的世界生活中不斷作爲實際的東西給予我們的世界)量體裁一件觀念的衣服(Ideenkleid)，即所謂客觀科學的真理的衣服。就是說，通過一種能在每一個別情況中實際實行的，並能被不斷證明的方法，我們首先爲生活世界的可具體地被直觀的形狀的實際的和可能的感性的充實構作量值指數，然後用這種方式獲得預言直觀地被給予的生活世界中的具體的，現在還沒有被實際地給予或不再被實際給予的事件的可能性”(59)。

在胡塞爾看來，世界出現的所有問題和危機似乎都與這種觀念化或觀念的外衣相關。他認爲，科學的危機實質上乃是哲學的危機，這種危機根本就是人的危機，他寫說：“哲學的危機意味著作爲哲學總體的分支的一切新時代的科學的危機，它是一種開始時隱藏著，然後日漸顯露出來的歐洲人性本身的危機”(13)。爲什麼是歐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機呢，胡塞爾認爲歐洲的人性就是理性，真正歐洲人的人性就是對理性的信仰，早在古希臘，episteme(純科學)是與 doxa(意見)相對立，episteme 作爲一種典範，賦予一切事物以價值，目的和最終意義，這就在最初爲歐洲人觀看世界設立了一張藍圖，以後通過柏拉圖的理型論更固定了這一藍圖，並且成了形而上學的本質，從而造成對具體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遺忘。

純科學與意見之區分，在海德格那裏，標志技藝(techne)之產生，而通過技術，人自身在隨之而來的形而上學時代中便越來越多地成爲自然的主宰者。海德格認爲，在柏拉圖那裏我們還可以覺察到對最初意義上的技藝的一種理解，但後來柏拉圖走上形而上學的存在之遺忘後，技藝在形而上學中就演化爲技術(technik)。海德格說：“技術在本質上是存在史上建立在遺忘中的存在的真理的命運，即它不僅在名稱上回溯到希臘人的τεχνη(技藝)，而且本質上它源於作爲存在者的αληθεια(無蔽，真理)的一種方式。作爲真理的一種形態，技術建立在形而上學的歷史中”(<路標>。337)。這一點我們在亞理斯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就可看出。技術是對“尚未生產出的不在場的事物的去蔽和揭示，在技術裏決定的東西是要把所要的東西生產出來，即通過技術把隱蔽的事物揭示出來。在海氏看來，一當技術演化爲“座架”中的存在遺忘，存在成爲存在者，人類在歷史中的厄運開始了。現代技術的本質與現代形而上學的本質是同一的。技術不只是人類使用工具的一種行爲，在各種技術背後，隱藏著人與世界的關系。作爲形而上學最後一位思想家，“尼採的強力意志將形而上學帶入其本質之完成，從而存在徹底被遺忘”，形而上學本質上就是虛無主義，以致造成現代社會存在遺忘的危機。

三. 面對危機時代，詮釋學將如何思攷呢、是否像以往哲學家所認爲的那樣，詮釋學對此能給出完全的回答呢？首先我們必須要理解詮釋學的特征。詮釋學的最大特征就是對我們自身有限性的意識。我們關於文本，自然，我們自身和我們世界的知識總是一種界限知識，我們總是被包含在解釋裏，我們不能直接接近任何像關於正義，自我，實在或‘道德律“，真理這樣的東西，我們對這些東西的“真理”的概念乃是被我們所隸屬的文化和我們所處的歷史境遇所制約的，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所關注的，就是要克服實證主義那種認爲我們可以發展一種關於我們所接觸的現象的“客觀的“知識這一自大態度.。那麼我們對此如何思攷呢？伽達默爾把詮釋學稱之爲詮釋學經驗，而經驗“就是對人類有限性的經驗。真正意義上的有經驗的人是一個對此經驗有認識的人，他知道他既不是時間的主

人，又不是未來的主人，這也就是說，有經驗的人知道一切預見的界限和一切計劃的不可靠性”(WMI，363)，“真正的經驗就是這樣一種使人類認識到自身有限性的經驗。在經驗中，人類的籌劃理性的能力和自我認識找到了它們的界限”(I，363)。對於伽達默爾來說，詮釋學經驗從根本上說，就是對我們人類自身的有限性的認識，從而對於生活的變遷和實際的事務更爲開放。。

顯然，不可能存在一種可適應科學向我們開啓的世界圖畫的根據。如果我們要從世界現狀出發而行動，那麼世界現狀並不是可通過先給予的規則或任何一種操縱就能控制。情況很可能是世界現狀按規則而發展，而我們根本不認識這些規則，甚至我們必須擔憂我們很可能成爲我們根本不能把握的某個過程的犧牲品或奴隸。時代問題不可能通過科學來回答，我們的判斷力如伽達默爾所說，‘只應當進入它所在的位置”。

古典詮釋學著重理解是主體對對象的客觀把握，而哲學詮釋學則強調主體與對象之間的雙向運動。理解永遠是相互理解，對某一事物取得相互一致。這樣就從根本上爲對話解決當代危機打下了深刻基礎。對話在伽達默爾看來，決不是話語暴力，而是平等商談，你不是我，你要充分重視，對話雙方對對話後果都沒有控制，因而任何對話都成了對話者難以預料的自然過程，它擺脫了對話者的主體意識，展現了對話自身的邏輯。這裏你這個簡單的人稱代詞，包括了文獻，藝術品，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對話中是“把握”遠超出認識論中的“認識”。伽達默爾講了三種不同的詮釋學經驗：(1)我與你的第一種最低級的關系是你被經驗爲一個類的成員，你被期望按照我通過經驗學會的規則去行動。如我觀察你時，我可以觀察你的行爲以獲得一些有關人類行爲的原則，並通過這一原則，我就可對人類的行爲作出推論。這就是自然科學觀察事物的方式，在這裏你只是一個手段，以讓我達到我的目的。這是一種使詮釋學經驗的本質失去固有光澤的圖解法；(2)我與你的第二種可能關系是，我承認你是另一個主體，而不是典型的一個對象。在這種關系中，我知道你不是一個物，而是一個人，每人都有他自己的見解，不過我也固守我自己的立場，雙方都固執已見，都要求對方接納自己的觀點。這是歷史意識的詮釋學方式。這種態度雖然比第一種要好，但我只肯定我而排斥你，這樣就對他人保持一種距離；(3)第三種真正的也是最高級的我與你關系是：我以完全開放態度承認你是一個人，真正把你作爲你來經驗，我不僅不忽視你的要求，而且我還要傾聽你對我所說的東西，這樣，雙方都不固執已見，而是彼此開放，這就是效果歷史意義的詮釋學經驗。效果歷史意識不僅意識到歷史是受效果影響的，而且也意識到對歷史的意識也是受效果歷史影響的。

對於哲學詮釋學來說，理解永遠是相互理解，即在面對文本，不同觀點和見解，他種生活形式和世界觀時，我們要讓我們自己的前見起作用並能豐富我們自己的觀點。伽達默爾認爲，在今天的社會關系裏，在工業革命時代，在所有生活關系不斷增加官僚機構化，在技術日益異化時代，我們在這被規則化(geregelte)的時代裏所缺乏的，不是自由空間，而是判斷力，他說：“我們缺乏的是判斷力，只有有了判斷力，我們才能在應用我們規則時學會感知真正的自發的返回”。

我們不可能用幾個大膽的幻想否認或改變這種世界趨勢，我們不能把對這種規則化世界的使用看成惟一能滿足我們的適當形式，因爲一切只是事先所規則了的東西的實現。

四．在伽達默爾去世前一年，我曾訪問過他，我曾經提出一個問題：“你怎樣看待詮釋學的未來？” 伽達默爾聲音清晰地說：“詮釋學需要一種幻想力或

想象力 (Phantasie)，這是確實的”。他說，在我們這個充滿科學技術的時代，我們確實需要一種詩的想象力，或者一種詩或詩文化。在 1992 年出版的一篇他與助手 DUTT 的對話錄中，他甚至還這樣說：“不是方法控制，而是詮釋學想象才是創造性精神科學家的標志!什麽是詮釋學想象呢？這就是對於問題以及問題所要求於我們的東西的敏感”。

在這次訪問中，他從很遠的地方講起，因爲他概括地證明現代世界及其數理自然科學和技術最終歸因於希臘文化以及對其哲學和科學的詮釋學應用。他說：“中國人今天不能沒有數學，物理學和化學這些發端於希臘的科學而存在於世界，但是，這個根源的承載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學今後將從其他根源找尋養料，特別要從遠東找尋養料”。他不知不覺地又重複他的預測，二百年內人們確實必須學習中國語言，以全面掌握或共同享受一切。另一方面，詮釋學還必須探討更原始的東西，比如“埃及的東西”，這種東西曾經如此深遠地對希臘發生影響，柏拉圖在<蒂邁奧篇>裏曾描述了一位希臘人訪問埃及，並問我們對它究竟知道什麽，同樣阿拉伯的東西，我們也應要知道，阿拉伯文化及其觀念長時期也對西方文化起了促進作用。伽達默爾顯然對歐洲和西方的語言-詮釋學視域的地區狹窄性表示不滿，他主張我們應當廣泛學習他種文化的語言和知識。

這使我想到了胡塞爾，胡塞爾曾經聲明，在歐洲文化中，在“意見”即生活世界的認識領域和在“知識”中的科學認識領域之間存在有一種斷裂，從“意見”中的充實可能性的有限性領域，到我們在“知識”中通過觀念化來強占的那些不再是直觀地被給予的無限性領域的過渡，並不是一個連續的過渡。反之，在歐洲之外的文化裏卻沒有在“知識”與“意見”之間做出割裂，與黑格爾主義之類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理解相反，這乃是相對於歐洲文化的過渡而言的一種清醒的選擇，一種真正的“謙遜”，或者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一種恰當理解了的“貧瘠”，在它之中包含一種洞見。人類的生存只有限制在生活世界-有限性的可能性中才能獲得它的充實。如果我們今天願意在文化間的對話中作好准備，以便無保留地來認識非歐洲文化的強處，我們就必須准許採納詮釋學的謙遜態度，它可以給出關於哲學和科學原初動機問題的答案，而後，通過觀念化而形成的對直觀性和有限性的超越便會顯現爲某種僅只是歐洲的東西，生活世界的範圍從而被擴展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在當代科技和人文出現危機時，詮釋學正是一種清醒劑，我們需要召喚一種詩性智慧來平衡我們社會的歧形發展。我們現在又回到一開始阿爾克邁的話，人類之所以毀滅，這在於他們不能把終點與起點相聯系，而詮釋學通過對過去以往文本的詮釋，與古人對話，把這種聯系建立起來，從而可能制止或者說延緩這種毀滅。